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國族的界限和文學史：論建構台灣新文學史與張愛玲研究

Literary History and the Boundary of the Nation: Focusing on
Aileen-Chang and Constructing Taiwanese New Literary History

doi:10.6752/JCS.200603_(2).0007

文化研究, (2), 2006

Router: A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2), 2006

作者/Author：任佑卿(Im WooKyung)

頁數/Page：253-279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2006/03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6752/JCS.200603_\(2\).0007](http://dx.doi.org/10.6752/JCS.200603_(2).0007)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
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
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Literary History and the Boundary of the Nation :
Focusing on Aileen-Chang and Constructing
Taiwanese New Literary History

—Im, WooKyung

國族的界限和文學史：
論建構台灣新文學史與張愛玲研究

任佑卿*

* 任佑卿，韓國女性文化理論研究所研究員。
電子信箱：renyouqing@hotmail.com

摘 要

九〇年代在台灣，隨著獨立意識的高揚，作為一個民族想像的主要制度，台灣新文學史編纂工作日益興盛。本論文要以對張愛玲的評價為主闡釋台灣文學史敘述所面臨的矛盾及其淵源和性質。第二部分將從張愛玲的亡命、後殖民、冷戰等脈絡中闡述張愛玲和台灣之間特殊的因緣開始形成的時空環境，第三部分論述90年代以後在為了鼓吹台獨意識重新建構台灣新文學史的過程中，主張包容張愛玲的陳芳明和主張告別張愛玲的邱貴芬的相反觀點。結語部分則要強調它們所描繪的國族界限事實上有多麼模糊，也要提醒，台灣文學史敘述如果歸結到「台灣國族主義」這樣的統合性宏觀敘事的話，它原來所具有的政治上的抵抗性很可能會消失。

關鍵詞

台灣新文學史、台灣民族主義、民族身分認同、張愛玲

Abstract

Since 1990s, with gradual consciousness of independence, writing Taiwanese New Literary History, as an important apparatus in imaging national community, has been one of the most heated controversies. However, it faces some embarrassing problems such as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political independence from and cultural identification with mainland China, and between national identity and that of minority. The essay scrutinizes the ideological, cultural dilemma centering on how Taiwanese evaluate Aileen-Chang in Taiwanese New Literary History. Part Two examines how Taiwanese accepted her, cross-checking in the specific context of her diaspora, postcolonialism, and cold war. In Part Three, The essay compares the opposite viewpoints of Chen Fangming and Qiu Guifen, while the former claims to accept Aileen-Chang, the latter claims not. These two representative critics advocate Taiwanese independence and rewriting Taiwanese New Literary History. In sum, the essay demonstrates that the boundary of nation is in fact arbitrary. It also reminds the hazard of that if writing Taiwanese New Literary History is subject to the "Taiwanese Nationalism," another grand narrative, its political resistive power and concern for minority might be lost.

Keywords:

Taiwanese New Literary History, ethnical identity,
Taiwanese Nationalism, Aileen Chang

E.P.S.

一、作為敘事的國族及其界限

1987年，解除戒嚴的同時，李登輝轉換原來的「反攻大陸」國是，強調本省意識，為實現台灣作為一個國民國家在國際社會中得到承認，開始採取一系列的措施。此後，台灣的本土派民進黨在1999年的大選中掌握政權，這種努力得以更加全面地實施。同時在知識界內部，鄉土文學論爭以1979年的「美麗島事件」慘然告終之後，左翼勢力明顯萎縮。相反，以本土意識為核心的意見對立逐漸擴大為「獨立派」和「統一派」的陣營對立。

台灣應該自立為堂堂的國民國家，此類獨立意識的高揚，促進了建構和編寫台灣歷史的努力。作為一個想像獨立的國民國家之機制，獨自的台灣新文學史也有必要編寫。但是這種要求也面臨著種種矛盾。因為，由台灣現代史的特殊性而產生的多種歷史身分認同，使得界定台灣的國民國家界限並非易事。其中，如何評價張愛玲的問題，集中展現出台灣新文學史的敘述所面臨的矛盾。

通常，所謂一國文學，應該繼承本國的文學傳統，同時基本符合國民文學史的要求，即，創作意識和背景也必須是本國的。但是以台灣為中心看待張愛玲，她絕對不符合上述條件。張愛玲既沒有出生在台灣，也沒有在台灣居住過。而且也未曾關注過台灣的現實，沒有創作過有關台灣的作品。因此，無法將張愛玲歸列為台灣作家，看來是理所當然的。但問題是，無論台灣的作家、文壇、學界，還是一般讀者，任何人都無法否認張愛玲對台灣社會的深刻影響。古繼堂的一番話如實地表現出這種矛盾：「她雖然未曾直接介入台灣文壇，但是卻吸引住了台灣文壇。不是她離不開台灣文壇，而是台灣文壇離不開她。」¹

事實上，一切國民國家的文學史與個別作家之間的這一矛盾是

1 古繼堂，《台灣小說發展史》，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2年，176頁。

普遍存在的；但是，如果被納入「我們是統一體」的國族共同體想像中，這一矛盾又可以得到化解。例如，魯迅也沒有出生在雲南，沒有關注過雲南，沒有描寫過雲南，但是對在雲南受過教育的人來說，魯迅是中國現代文學之父這個事實屬於常識。因為他們已經認同了，自己與魯迅一樣都是「中國人」。西藏、新疆、哈爾濱、蒙古等地的情況可以以此類推。這種認同之所以成為可能，是因為國族國家裝置將領土的界限轉換為歷史的同一性，從而彌補了其中的不一致性。但接下來的問題是，當這個想像共同體被打破後，情形就變得複雜了，尤其在類似台灣、新疆、蒙古、西藏這樣的邊緣地區。

同樣，張愛玲不是台灣出身的確是既成事實，但是在「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這種國族共同體想像之中，它就絲毫不會成為問題。但是，如果要將台灣的領土界限劃定為從中國大陸分離的一種國族國家界限的話，張愛玲是否屬於台灣就不能不成為問題。如果根據熱南(E. Renan)的說法將國族定義為「意志」的產物的話，台灣意識正在轉化為企圖將台灣從中國大陸分離的又一種國族共同體的意志。一些成員們拒絕「中國人」身分而只要「台灣人」身分的「意志」，將既成事實轉化為問題化的事實，並要求改寫以前毫無疑問的國族想像的教義內容：台灣人和張愛玲一樣是中國人。要構建又一個在政治上獨立的國族共同體，自然需要新的文化想像。從這樣的需要，現代文學制度才深深地介入到政治社會性國族宣言。

國族的身分認同正是建構於包含此類意志的敘事之中，即國族的教義性時間(temporality of the pedagogical)²之中。但是此教義性時間要不斷地與其他意志的敘事進行競爭。作為敘事的國族表明，國族並非是具有某種起源的歷史實體，而是一種必須具備遂行性時間(temporality of the performative)³的文化組成體。而且敘事之間不斷的競爭顯現出國族界限的不確定性和模糊性。台灣文學史的敘述根本上

2 請參照 Homi Bhabha, “DissemiNation: Time, Narrative, and the margins of the modern nation”,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Routledge 1994), p.145.

3 Ibid.

是一種為確立台灣國族身分認同而努力的教義性國族敘事。同時它又在反襯出台灣這一國族界限事實上有多麼模糊。

圍繞對張愛玲的評價，台灣文學史敘述所面臨的矛盾，很好地體現出作為敘事的國族及其界限所具有的模糊性。尤其是它包含著，對中華文明的認同需求和作為新政治共同體的獨立要求之間的尖銳矛盾，即，歷史文化上的身分認同與政治上的身分認同之間所具有的尖銳矛盾。台灣新文學史敘述本來是一種將領土內部多樣的時間構築為一個單一的歷史時間的國族統合企圖，但同時，它又不得不面臨怎樣處理要防礙和脫離那種企圖的多樣身分認同的需求的難題。

本論文要以對張愛玲的評價為主闡釋台灣文學史敘述所面臨的矛盾及其淵源和性質。第二節將從張愛玲的亡命、後殖民、冷戰等脈絡中闡述張愛玲和台灣之間特殊的因緣開始形成的時空環境。第三節論述1990年代以後在為了鼓吹台獨意識重新建構台灣新文學史的過程中，主張包容張愛玲的陳芳明和主張告別張愛玲的邱貴芬的相反觀點。結語部分則要強調它們所描繪的國族界限事實上有多麼模糊，也要提醒，台灣文學史敘述如果歸結到「台灣國族主義」這樣的統合性宏觀敘事的話，它原來所具有的政治上的抵抗性很可能會消失。

二、後殖民主義、冷戰、離散

（一）張愛玲和《秧歌》

1952年夏天，張愛玲離開上海，來到香港。理由是為繼續因戰爭而中斷的學業。但這極有可能是為離開已經共產主義化的大陸的藉口。由於有關張愛玲在1945年以後，尤其是新中國建立以後的資料相對缺乏，目前尚無法準確考證她決心前往香港的背景。只是她的文學志向和現已查明的部分資料表明，從日本戰敗到新中國的成立為止，其間的社會環境確實沒能帶給張愛玲個人安全感。

譬如，1945年中期至1947年春及1947年12月至1950年3月的兩次沈默；評論界對1947年張愛玲的兩部票房頗佳的電影《不了情》、《太太萬歲》的抨擊；1950年3月至1952年1月，張愛玲在《亦報》連載《十八春》和《小艾》時只能使用「梁京」的筆名；《十八春》和《小艾》中，與張愛玲的一貫作風格格不入的政治性「大團圓」結局等，從這一系列現象中我們能夠窺見當時張愛玲心中的不安。雖然，「共產黨根本瞧不起她，並不拿她當作一股『反動力量』」⁴，甚至，當時的實權人物夏衍還照顧她，將其安排到電影劇本編撰組。但那時張愛玲已經前往香港。對比曾經與張愛玲一起活躍在淪陷區上海的著名女作家蘇青的不幸遭遇，也能夠設想，如果張愛玲不離開上海，其命運應該是大致相同的。

這一設想首先可在發行於1953年的王瑤《中國新文學史稿》中得到證實。王瑤此著堪稱新中國第一部現代文學史專著。但是對曾經輝煌於上海文壇的張愛玲，書中竟然隻字未提。不僅是張愛玲，甚至整個淪陷區文學史也都是空白。同親日文學在韓國受到排斥的理由相同，包括張愛玲在內的淪陷區文學也同樣被人排斥和遺忘，這在後殖民時期中國國族文化的建設過程中，被視為理所當然的事情。這一空白直至二十世紀80年代以後在中國大陸重新興起「現代化論」之時，才開始引起學術界的注意。

在韓國和中國都有被稱為「親日文學」、「皇民文學」、「漢奸文學」、「淪陷區文學」等的殖民地時期文學。二戰以後，以建立獨立自主國家為目標的反殖民民族主義在確保自己主權的正當性的過程中，如何對殖民時期文學進行文學史的評價，就成為了最受矚目的問題；但與此同時，它作為國族歷史的污點和恐懼的記憶又是不願被提及的。過去很長時間東亞國家對日本殖民地時期文學的研究大都停滯不前絕非偶然。而且，尤其在東亞，後殖民問題不可避免地要取決於冷戰秩序的構建。朝鮮半島的後殖民歸結於南北朝鮮的分裂；中國

4 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史》，香港，友聯出版社，1979年，357頁。

的後殖民歸結於兩岸的分裂，後殖民的努力進行在各自的冷戰界限之內。

當時張愛玲的行走就在這種後殖民和冷戰等政治混沌之中。當時香港仍然是英國的殖民地，而且是資本主義世界對新中國的前哨基地。張愛玲在香港的生活並非一帆風順，尤其在試圖定居日本的努力失敗之後，張愛玲開始接連遭遇極為不利的境遇。其中最困擾她的是經濟問題，其間她主要依靠翻譯美國新聞處的稿件維持生計。當時是冷戰初期，「美國政府賦予駐香港美國新聞處的主要任務是中國文學的翻譯，尤其要求翻譯和介紹反共傾向鮮明的現代文學作品。」⁵張愛玲用英文翻譯了台灣作家陳紀澄的中篇小說《荻村傳》。⁶該作品描述了從義和團起義到日本侵華期間，一個純樸的中國農民如何分別被北洋軍閥、日本軍隊和共產黨所利用。這肯定對張愛玲後來創作反共長篇作品《秧歌》和《赤地之戀》產生了相當的影響。

《秧歌》描述了新中國成立之後發生的一場農民暴動。與作家的真意和文本的模糊性無關，這部作品作為反共作品而揚名。《秧歌》連載於香港雜誌《今日世界》，後於1954年7月由今日世界出版社出版單行本，第二年在美國出版了英文版，而後《紐約時報》等美國媒體爭相刊載了有關《秧歌》的高度評價。毋庸置疑，它們所關注的正是作品的反共傾向。借助媒體的高度評價，《秧歌》在此後的10餘年間，出版了23種外文版⁷，不覺間被當作張愛玲的代表作，她也由此被劃歸反共作家之列。

或許已經沒有人記得，1956年在韓國也出版過《秧歌》的韓文版，題目叫《米》。翻譯者徐廣淳當時的活動現已無法查明，但是他所利用的原本是1955年的紐約英文版，可見他很大程度上趨同於美國的視角。在此我們需要注意的首先是刊譯之快速：在香港為1954年、

5 宋明燁，《浮世的悲哀：張愛玲傳》，上海文藝出版社，1999年，233頁。

6 詳情請參考上書，233頁。

7 同上書，233頁。



美國為1955年、韓國為1956年；其次是美國在香港和韓國之間的仲介作用。日本戰敗後，美國在日本和韓國實施軍政，並以朝鮮戰爭為契機，為加固美國在東北亞的霸權和冷戰秩序，積極地在韓國、日本、台灣構築強有力的親美反共政權。這表明，上述國家的戰後國族文化建設並沒有純粹依靠本國內的後殖民主義努力，而是與美國的資本和軍事力量主導的世界冷戰秩序的構築有著密切的關聯。

同樣，張愛玲之能夠順利地被介紹到台灣，也與上述環境有著密不可分的關聯。張愛玲首次被介紹到台灣的，並不是她的作品，而是夏志清對她的評論。1957年，夏濟安在自己主編的自由主義傾向的雜誌《文學雜誌》中翻譯刊載了夏志清對張愛玲的評論。事實上，彼時蔣介石政府將自己在大陸的抗日運動確定為自身正統性的核心，全力剷除親日派。因此，被視為親日派作家的張愛玲本來幾乎不可能被二十世紀50年代的台灣所接受。但正是因為張愛玲通過《秧歌》和《赤地之戀》獲得的反共作家的名聲和夏志清評論的反共傾向，恰好與蔣介石政府的反共政策相吻合，她才得以被介紹到台灣，並被接受。

如果沒有冷戰，就不會出現後來在1980、90年代轟動大陸和台灣文壇的張愛玲現象，她或許就從此永遠消失在歷史的洪流之中。但是張愛玲本人卻絲毫沒有預想到這些，她於1955年離開香港，踏上前往美國的客輪。無論是在大陸、香港和台灣，她都沒能找到落腳之處，最終抱著「不知身在何所」、「漂泊流落的恐怖」⁸心理，踏上了陌生的土地。

8 張愛玲，〈浮花浪蕊〉，《惘然記》，廣州，花城出版社，1997年，255頁。

(二) 夏志清和《中國現代小說史》

張愛玲能夠成為中國現代文學史中最有爭議的作家，起到決定性作用的正是夏志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夏志清生於上海，就讀於美國耶魯大學英文專業。他在偶然的機會作為美國著名的反共政治學家大衛·勞(David N. Rowe)的研究助手，於1951年參與了美國政府資助項目《中國入門》(*China: An Area Manual*)的著述。此書曾限量(350部)提供給美國軍界政界的高級官員閱讀，結果被認為反共傾向過於露骨而未能通過最終審查。但是夏志清在此書的著述過程中察覺到沒有一本面向西方讀者介紹中國現代文學的入門書，於是決定自己撰寫。他的計畫立即得到洛克菲勒財團的支援，1952年開始工作，1955年接近完成。但是由於種種原因，直至1961年才由耶魯大學出版社以*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為題出版。⁹

夏志清是一個徹底的反共主義者，反對文學被政治性目標所利用；作為英美文學學者，他標榜近代西方的資產階級人道主義文學觀。因此，他的觀點同以王瑤《中國新文學史稿》為代表的中國現代文學著述相比，理所當然地存在著差異。作為對抗中國大陸意識形態的著述，夏志清此書得到非常高的評價，亦大受歡迎，其中文版的翻譯由劉紹銘主持，十多位香港、台灣、美國學者參與，於1979年在香港友聯出版社出版發行。

劉紹銘在譯本序言中稱讚這本專著為「經典著作」，稱其精彩之處在於高度評價了張愛玲和錢鍾書。¹⁰由於大陸的文學史中隻字未提此兩人，這一點顯得尤為突出。夏志清對張愛玲情有獨鍾，稱其為「當今中國最優秀、最重要的作家」。¹¹他在此書中介紹張愛玲的篇幅比魯迅多出了二十多頁，這一點在此後成為評論家們關注和爭論的

9 細節請參照夏志清的同上書序言。

10 劉紹銘，〈經典之作〉，夏志清，同上書，24頁。

11 同上書，335頁。

焦點。夏濟安翻譯和刊載在《文學雜誌》中的正是《中國現代小說史》（以下簡稱《小說史》）中的張愛玲部分。

正如浦魯塞(Pruseck)的主張，看來我們無法否認，夏志清力圖徹底排斥政治性的文學志向本身，其實恰恰起因於他的反共政治傾向。當初他對張愛玲的好感顯然開始於被評價為反共作品的《秧歌》和《赤地之戀》，而他能夠高度評價張愛玲40年代的作品也是因為其非政治化的傾向。

但同時，夏志清的這些舉動不僅起因於他的政治傾向，還同時顯露出作為移居到第一世界的第三世界學者，他所感受到的身分認同不安感。1979年出版的《小說史》中文版序言中，他就如下開口：

1951年春天，我一方面忙於寫論文，一方面真不免要為下半年的生活問題著急起來。我雖然是耶魯英文系的優等生，系主任根本想不到我在美國謀教職的：東方人，拿到了博士學位，回祖國去教授英美文學，這才是正當出路¹²。

因為無法回到共產化的祖國，要為長期出路苦惱的東方人夏志清，其解決苦惱的契機正在於他與大衛·勞教授的相識。隨著中國大陸的共產化，當時美國正為建構對中國的情報而盡力。夏志清鮮明的反共傾向，對於改善作為第三世界學者的他在美國的不利地位，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此後他就得以在美國講授中國的文學、思想、哲學，順利地定居下來。這是因為他成功地完成了作為國際公民向第一世界提供第三世界的文化資訊的作用。

撰寫《小說史》的初期，作為英美文學專家，其文學評價的普遍標準是，立足於宗教精神而執著於人生的終極意義和道德問題的十九世紀西方文學。依照此標準他對被意識形態所左右的中國現代文學只能發出慨歎：「那些小說家技巧幼稚且不說，他們看人看事也不夠深入，沒有對人心作深一層的發掘」。¹³他將張愛玲評價為中國最好的作家，其標準無非就是張愛玲最接近於普遍的西方文學。他稱張愛玲

12 同上書，3頁。

13 同上書，12頁。

為「目前中國最優秀最重要的作家」之後，又說：「她作品的水平能夠與曼斯費爾德、福特、威爾特、麥克爾斯等比肩，甚至更高。」¹⁴為強調張愛玲的優秀，他不斷地列舉勃朗特姐妹、簡·奧斯丁、陀斯妥耶夫斯基等西方著名作家，此舉將他對西方近代性的自卑感和強迫心理暴露無遺。夏志清對張愛玲的高度評價，我們將其看成是東方人對自我的自卑感做出的無意識補償和治癒也無妨。

但是過了二十餘年之後，《小說史》的中文版序言表現了夏志清的研究生涯事實上擺脫了根深蒂固的西方情結，開始獲得國族自尊心，開始逐步確認自己作為中國人的身分認同。在此序言中他說：「但現在再想，拿富有宗教意識的西方名著尺度來衡量現代中國文學史不公平的，也是不必要的」。¹⁵繼而得出和解化的結論：「富於人道主義精神，肯為老百姓說話而絕不同黑暗勢力妥協的新文學作家，他們的作品算不上『偉大』，他們的努力實在是值得我們崇敬的。」¹⁶如此的觀點變化，也許與其說是因為他放棄了將西方作為「偉大」之標準的觀點，不如說是國際公民內部對承認多元文化主義和混合性身分認同的要求激增所帶來的結果。

不管怎樣，在此需要指出的是，貫穿於夏志清的文學評論和《小說史》中有關國族身分認同的不安和自卑感，與台灣的身分認同危機感有著相通之處。而張愛玲恰好成為能夠解除這種身分認同不安和危機感的文化想像的資源。也就是說，對張愛玲的高評價培養了「中國也能推出世界性作家」的自尊心，同時也傳達了一種微妙的對立意識和自我滿足心理，即：如此優秀的作家唯獨在自由中國——台灣，而不是在中國大陸受到重視，進而形成了國族的正統性在於台灣，而不是中國大陸。台灣對張愛玲的接受和形成於冷戰秩序中的台灣國族身分認同問題之間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這一點還將在以下對陳芳明、邱貴芬的論述中再次得以證明。

14 同上書，335頁。

15 同上書，16頁。

16 同上書，16頁。



有趣的是，80年代大陸的許多研究者對張愛玲產生興趣的重要契機之一同樣是夏志清的《小說史》。文化大革命結束，開始進行市場改革的80年代，中國的社會主義官方意識形態面臨著嚴重的挑戰。譬如對文化大革命期間已成為官方意識形態宣傳品的魯迅，一些文學研究者們提出要將魯迅解讀為「魯迅的本來面目」，這些主張就是對官方意識形態的間接批判。解體包括魯迅在內的社會主義經典，發掘自由主義的對抗性文本，在這樣的語境之中，將張愛玲置於魯迅之上的《小說史》及其非政治的純文學傾向，足以帶來新鮮的衝擊和好感。

張愛玲打上反共小說烙印的兩部作品《秧歌》和《赤地之戀》，至今在中國大陸還是官方禁書。由於多種原因，大陸的許多學者也無法欣然苟同於夏志清的觀點。但是無論認同與否，從結果上看，夏志清對張愛玲的解讀以及內在於其中的冷戰意識形態和國族身分認同危機感，此後在中國兩岸和美國都成為了評價張愛玲的起點。張愛玲在中國現代文學中成為與魯迅並列的經典作家，夏志清的《小說史》功不可沒。同時，在穿梭後殖民、冷戰／後冷戰以及大陸—香港—台灣—美國這一時空界限的過程中形成的張愛玲的經典化，讓我們再次想起劉禾的觀點：第三世界國族經典的創造不完全在國族內部進行，而是在與第一世界的共謀下進行。¹⁷

三、國族敘事與文化身分認同

（一）陳芳明的台灣新文學史論與張愛玲

陳芳明是代表台灣獨立派的核心人物，主導著90年代以後台灣新文學史論爭。他主張，張愛玲雖然的確不具備編入台灣新文學史的基本條件，但是又不得不將其編入。他在〈張愛玲與台灣文學史編撰〉

17 詳細內容請參照劉禾，《跨語際實踐》，三聯出版社，2002年，第7章。

¹⁸一文中，通過對於戰後台灣文壇的幾次論爭的疏理，論述台灣文學史拒絕張愛玲的原因。

據他的分析，至70年代初，張愛玲之能夠在台灣受歡迎，夏志清、夏濟安兄弟將其評價為中國現代文學的最高峰以及水晶等海外研究者運用新批評理論奠定張愛玲研究的基礎等，起到了重要的影響。但是經歷了1970年的釣魚台運動、1971年退出聯合國、1972年對日斷交等一系列政治事件之後，台灣知識分子對台灣本土文化的關注前所未有地增強，文學思潮也提倡以本土文化為基礎的現實主義。在此過程中，夏志清、水晶等海外派學者的文學評論受到本土知識分子的挑戰，張愛玲的歷史地位也隨之成為敏感的問題。

現實主義流派的代表理論家林柏燕曾主張：「張愛玲的小說，可以是中國文學的一支，但作為自由中國的文學，其意識是相當淡薄的，其背景與自由中國更扯不上關係。」¹⁹由於彼時「台灣」這一單詞本身被視為禁忌，陳芳明（在90年代）將林柏燕的「自由中國意識」解釋為「台灣意識」。又稱，根據林柏燕的邏輯，張愛玲無法被視為台灣作家。但是在對待林柏燕與水晶之間關於張愛玲的論爭時，陳芳明最終還是站在了水晶一邊。因為現在看來，水晶所謂「張女士註定要在自由中國，成為最重要的作家，受到許多後來者的推崇和讚美」²⁰的預言是正確的，而且「在撰寫台灣文學史時」，不得不「正視廣闊的張愛玲文學流域」²¹。他強調台灣意識，卻支持海外派的觀點，看起來似乎相互矛盾。但是他沒有對此做出恰當的解釋，隨即轉入對張愛玲研究的又一重要人物唐文標的批判。

如果說水晶是出於崇拜和迷戀而仔細分析張愛玲作品的「張迷」，唐文標則是為了批判張愛玲的人氣而收集和研究的有關張愛玲的

18 陳芳明，〈張愛玲與台灣文學史編撰〉，《閱讀張愛玲》，麥田出版社，1999年。

19 同上書，421頁。

20 同上書，421頁。

21 同上書，422頁。

資料。唐文標是60年代因完全否定台灣新詩的成就從而引發新詩論爭的主角。他的信念是，作家應該擔負社會改造的責任。他對張愛玲的研究也是從這種信念引發的。因此在他看來，在「秉於全民抗日大義，大家都『應當』寫國族正義那樣的東西」²²的日本侵略時期，張愛玲竟然描述淪陷區小市民的日常生活，就應該受到批判。但是陳芳明對唐的上述觀點持否定態度。陳芳明認為唐文標的觀點是「國族主義美學」，「建基於普遍主義之上，亦即所有的作家都應該符合一致的要求」。批判唐文標的主張為「這種龐大的『民族自我』從現在的觀點來看，乃是一種變相的權力中心之建構」。²³

陳芳明認為，張愛玲的意圖正是擺脫此類民族自我的控制。即，她忠實於表現殖民地女性的生活，正是對殖民主義和男性沙文主義的反抗。而且從斯皮瓦克(G. Spivak)提出的「對他者的搭話」的意義上講，她的作品是「典型的後殖民呈現(postcolonial representation)」，也是對中華國族主義的虛構和神話的透視。從這裡能夠明顯地看出陳芳明之所以積極接受張愛玲的企圖。他從張愛玲的文本中導出「後中心」、「後殖民」的關鍵字，並試圖將其運用到對大陸中心中華國族主義的批判及台灣獨立意識的鼓吹。這與他基於後殖民主義將台灣現代史定義為殖民歷史的台灣新文學史論一脈相承。

陳芳明對新文學史的時代劃分，集中體現著其台灣新文學史論的特徵。他將台灣新文學史劃分為日帝殖民時期(1921 - 1945)、戰後再殖民時期(1945 - 1987)、戒嚴解除之後的後殖民時期(1987 -)。他將蔣介石的國民黨政權定義為殖民政府，將1945年之後至解除戒嚴的1987年定義為戰後再殖民時期。這一觀點，恐怕對於理所當然地將台灣認定為中國的一部分的人而言，很難乃至無法認同；而陳芳明則理由如下：

人類歷史上的殖民時期，都隨著終戰的到來而告一段落。……台灣在戰後並沒有得到反省歷史的空間與機會。

22 同上書，435頁。

23 同上書，427頁。

國民政府來台接收，帶來了強勢的中原文化。……尤其是1950年以後，國民政府基於國共內戰的失敗教訓，更加強化其既有的以中原取向為中心的國族思想教育，同時以武裝的警備總部為其思想檢查的後盾。為了配合反共國策，國民政府相當周密地建立了戒嚴體制。這種近乎軍事控制式的權力支配方式，較諸日本殖民體制毫不遜色。……就像日據時期官方主導的大和國族主義對整個社會的肆虐，戰後瀰漫於島上的中華國族主義，也是透過嚴密的教育體制與龐大的宣傳機器而達到囚禁作家心靈的目標。²⁴

將國民黨政權認定為殖民政府，而不是內部專制體制，這一觀點正如陳映真的主張，有待進行對殖民理論的探討以及通過台灣社會構成體的嚴密社會科學論證。²⁵但是如果依據陳芳明的主張，將戰後台灣社會定義為再殖民社會，那麼台灣社會的最大志向當然就會歸結到後殖民；而且擺脫大陸中心的中華國族主義，無疑就是台灣文化後殖民的關鍵。

陳芳明自己最近編撰過《台灣新文學史》，並且主張，基於台灣本土意識的台灣新文學史編撰就是「後殖民呈現」。台灣新文學史的編撰如何為處於邊緣地位的台灣文學定位的問題，也是斯皮瓦克所說的「搭話」，也是「後殖民呈現」。而張愛玲的文本為處於邊緣地位的女性找回了語言。因為這一點，陳芳明認為，張愛玲的文本便成為典型的「後殖民呈現」。

陳芳明將張愛玲文本解釋為「後殖民呈現」以及對中華國族主義和男性沙文主義的批判，所以張愛玲文本應該說最具備作為被他解釋為「後殖民呈現」的全新台灣新文學史的組成部分的資格。在後殖民話語體系中解讀張愛玲，陳芳明的這種意圖在其將張愛玲的邊緣生活和台灣的邊緣地位等同化的修辭學中得到了充分的體現。他在談及張愛玲的「孤獨旅程」或「流離失所」(diaspora)時使用的「孤島」隱

24 陳芳明，〈台灣新文學史的建構與分期〉，《聯合文學》15卷10期，1999年8月，164頁。

25 陳映真對陳芳明的批判，請參照〈以意識形態代替科學知識的災難〉，《聯合文學》16卷9期，2000年7月。

喻，正是對政治上被邊緣化和被遺忘的台灣做出的形象化描述。

另一方面，他對台灣的邊緣化身分認同的關注，其實首先與他對戒嚴解除後在台灣社會內部急劇顯露出的各種文化身分認同矛盾的關注有著密切的關聯。這些關注致使他在敘述全新台灣新文學史的過程中遭遇到眾多棘手的問題。如，如何處理日帝時期活動在台灣的日籍作家或戰後初期在台灣具有影響力的大陸左翼作家、原住民作家、女性作家、同性戀作家等的文學。換言之，對待台灣新文學史的範圍時，他所採取的柔和而具有彈力的態度，正是起因於他對作為「後殖民呈現」的台灣新文學史如何解決這些少數群體身分認同問題的思考。

但是問題在於，對少數群體身分認同的關注難免要與台灣新文學史的敘述形成矛盾關係。因為文學史敘述本身需要做的是，建構一個社會的經典，將其內在關聯看作為歷史的發展規律。因此它從一開始就具有鮮明的企圖，要將相異且複雜的物件整合為統一的單位。同時，「台灣的」文學史編撰終究是為整個「台灣」社會的自我理解和身分認同而創造文學史規範的工作。因此，陳芳明的台灣新文學史論雖然以克服中華國族主義這種權力話語為目標，但，一旦受到試圖將中華國族主義替換為台灣國族主義的強烈政治意圖的支配，那麼它與少數群體文學的評價問題就只能陷入更深的矛盾之中。

而且，為擺脫這種矛盾而做出的努力，在文本的解釋過程中往往產生深刻的「有意識的誤解」或盲點。陳芳明的矛盾，被他在將張愛玲描述為「後殖民呈現」的過程中有意識地忽略的一個盲點所掩蓋。那就是，被他解釋為反中華國族主義的張愛玲的文本，恰恰可能是最符合中華國族主義的文本。因為，陳芳明所說的張愛玲文本中的「後殖民」，其實，從政治上講是對日本和西方帝國主義的反抗，其反抗主體當然要假設為中華國族。張愛玲的文本一直排除政治色彩，但是她自己從來沒有否定過中華國族本身。反而，她的文本裡到處可以找到，對呈現為西方的他者的中國和中國人的強烈自覺。而且，由於她對「親切而古老的記憶」的重視，她的文本可以讓一些讀者能從其

中找到某種中國固有的東西，而滿足他們對國族文化想像的欲求。正如陳芳明本人也承認的那樣，張愛玲之所以在台灣具有如此巨大的影響力，最重要的因素正是，張愛玲的文本中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深厚記憶。²⁶

還有，更關鍵的問題在於，張愛玲所拒絕的不是中華國族的國族主義，而是作為男性主義的支配意識形態和宏大敘事的國族主義本身。張愛玲將作為支配意識形態的國族主義視為「男性的病」。有關階級鬥爭、革命、歷史、戰爭等那些宏大敘事一般把日常生活裡的小人物經常都異化或物件化。張愛玲反對國族主義宏大敘事如此把不可統約的多樣人生還原為如國族英雄般的單一人生，她一直固執地描寫作為少數群體的女性們被宏大敘事排斥到邊緣的種種無奈人生。這樣看來，對張愛玲來說，主要的問題不是哪一種國族主義，而是作為宏大權力敘事的所有國族主義。

因此，在淪陷區執著於呈現邊緣存在的張愛玲的文本，確實可以解讀為「後殖民呈現」，但是如果像陳芳明那樣直接將其聯繫到反中華國族主義，就過於勉強了。而且，如果陳芳明的後殖民論述僅限於將中華國族主義替換為「台灣國族主義」的層面，那麼他只能陷入自己邏輯矛盾的困境。因為，他為脫離中華國族主義而所要專有 (appropriate) 的張愛玲文本，反倒又可能成為他要鼓吹的台灣國族主義這一宏大敘事的對抗性文本。

26 因此，像邱貴芬所分析的那樣，一些人也可能會通過張愛玲文本「想像中國」。但是，對張愛玲那些東西是否可以說是中華國族主義這問題，還得另當別論。而且，因為她的文本還包括女性獨特的民族國家想像、對傳統與現代的想像等微妙而很重要的問題，所以不能簡單地回答為是或者不是。

（二）建構台灣女性文學傳統和張愛玲

事實上，陳芳明所不可避免地需要面對的問題中最令其困惑的是，張愛玲在台灣的至高地位正是基於夢想尋根的台灣人的「想像中國」。如果說張愛玲是台灣「想像中國」，即，有關中華國族主義的文化想像的重要媒介，那麼包容張愛玲的陳芳明，是否也不覺間深陷於中華國族主義之中？同屬於台灣獨立派，卻主張台灣新文學史應該告別張愛玲傳統的邱貴芬，她的主張很好地體現了陳芳明所面臨的上述矛盾。

邱貴芬曾經對製造張愛玲現象的台灣文化生產過程進行了分析。²⁷她說：「台灣愛慕張愛玲，幾已到達『傾城之戀』」。尤其在張愛玲逝世之後的1995年掀起的張愛玲熱，表明她不僅是單純的作家，而幾乎是「超級符號」。而且，文化界人士的禮讚、出版社編輯的個人回顧及出版界巨頭們的促銷活動、學者和評論家的評論、到處氾濫的張愛玲的照片和圖片等都表明，張愛玲在台灣的文化產業之中處於物神(fetish)的地位。張愛玲現已必須加上引號標記為「張愛玲」，她成為台灣主流媒體製造出的文化符號。

那麼，上述台灣的「張愛玲奇蹟」或「張愛玲的戀物化(fetishize)」是如何形成的？在深層支撐它的文化心理是什麼？邱貴芬首先指出了台灣人的「想像中國」的欲望。她指出，張愛玲充滿世紀末中國的頹廢和世俗蒼涼的文本，恰好映射了移居台灣的大陸人對中國所持有的愛憎交叉或鄉愁和拒絕相矛盾的心理。而且，台灣人對隱居美國的作家張愛玲本人的好奇和仰慕，正是對中國的仰慕的延續，他們通過對張愛玲敘事的不斷再生產和戀物化，得到「對中國的失落感」的補償，同時也得以持續「想像中國」的欲望。

與台灣女性文學相聯繫，邱貴芬更加具體地注意到張愛玲熱開始

27 邱貴芬，〈從張愛玲談台灣女性文學傳統的建構〉，《閱讀張愛玲》，麥田出版社，1999。

全面形成的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當時是鄉土文學論爭以悲劇告終的同時台灣女性文學悄然興起的時期。對於張愛玲熱和女性文學產生直接聯繫的原因，她首先從文化產業和制度這一外部環境中尋找答案。她認為，張愛玲熱的開端是蔣曉雲在1976、1977、1978年連續獲得《聯合報》小說獎。這一小說獎具有巨額獎金，而評委正是張愛玲的忠實讀者朱西甯和夏志清。對蔣曉雲的評論中，夏志清多次提到張愛玲和蔣曉雲的相似點，將張愛玲作為重要的判斷標準。蔣曉雲的名聲因此自然而然地聯繫到張愛玲。此後，蕭麗紅、袁瓊瓊、蘇偉貞等所謂「張派作家」的女性作家連續獲獎。再加上朱西甯麾下的「三三集團」作家們和朱天文、朱天心等，張愛玲熱開始全面形成。

女作家的作品多數為通俗的和非政治的愛情小說。她們之中的張愛玲熱與高度政治化和意識形態化的鄉土文學論爭，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前者是對後者的反動，它起因於被鄉土文學論爭搞得非常低沉的文壇試圖從政治以外的題材尋找突破口的努力。但是邱貴芬主張，深入地分析就會發現，張愛玲熱其實是包含於鄉土文學論爭之中的意識形態鬥爭的延續。她認為，這一點明顯地體現在張愛玲熱的骨幹——三三集團的性質之中。

邱貴芬同意楊照對三三集團的觀點：她們「對應鄉土文學，企圖創造一個以大中國文化為中心的行動原則」。²⁸她也認為，強調中華文化的精髓，主張時代的、社會的問題應該融入個人的感應之中是三三集團的要求，正好符合張愛玲文學的特徵。鄉土文學論爭和張愛玲熱表面上看似相反，卻處於同一延長線上。邱貴芬認為，是因為兩者同樣具有的「想像中國」的成分。因為鄉土文學論爭終究也是起因於來自「中國的喪失」的威脅和不安。同時，以三三集團為核心的張愛玲熱，製造和複製「張愛玲」，將她的文學傳播給台灣的子子孫孫，堪稱是維持「中國想像」的重要活路。來自「中國的喪失」的不安感因此從來自張愛玲熱的「想像中國」之中獲得治癒和挽回的機會。

邱貴芬刻意強調張愛玲熱的文化產業背景，是因為她力圖將張愛玲熱「去自然化」。因為，通過張愛玲的戀物化形成的台灣的「中國想像」理所當然地得到推崇。因此將張愛玲熱去自然化，也就成為消除台灣「中國想像」的重要一環。邱貴芬看來，如此自然化的「中國想像」集中體現在以張愛玲為核心的所謂「張派作家群」的譜系之中。而將張愛玲納入到台灣的文學譜系之中，開始於在美學者王德威。

王德威在題為〈「女」作家的現代「鬼」話〉的文章中，編制了台灣女作家的譜系。²⁹這篇文章闡述了張愛玲、女性主義、台灣女性小說的關聯。該論文廣泛地被接受，堪稱台灣女性文學傳統研究者的必讀論文。此後，王德威又將白先勇等男性作家也歸類到「私塾張愛玲套」的「張派作家群」，稱張愛玲為他們的「祖師奶奶」。他也在〈落地的麥子不死〉一文中，將張愛玲和張派作家之間的譜系視為當然的前提，論述了他們之間「影響的焦慮」。³⁰

如果是在「中國想像」的脈絡之中，王德威將張愛玲納入台灣文學譜系之中似乎毫無問題。因為，台灣的張愛玲傳統就是台灣的中國傳統的延續。但是看似如此「自然而合理」的文學繼承關係，如果從邱貴芬等台灣獨立派的視角看待，就存在著眾多問題。如上文所講，張愛玲無法滿足台灣文學史的基本條件。即，確立台灣作為一個新的國族共同體的身分認同。而且，起到了持續台灣的「中國想像」——借助陳芳明的邏輯就是殖民主義的想像——的強力的媒介作用。

因此在邱貴芬看來，「我們必須拒絕將張愛玲的台灣文學譜系視為理所當然」，只有「拒絕將『張愛玲』的介入，視為一個自然的歷史事件」，³¹台灣女性文學固有的特殊歷史性及本土性要求才不會變成空洞的口號。同時，只有「告別張愛玲」，才能發掘其間在台灣文

29 王德威，〈「女」作家的現代「鬼」話〉，《想像中國的方法》，北京，三聯書店，1998年。

30 王德威，〈落地的麥子不死〉，同上書，249頁。

31 邱貴芬，同上書，447頁。

學史中被抑制的聲音。邱貴芬進而主張，應該將此前集中在張愛玲身上的文化資源，分散給其間被「張愛玲」的陰影所遮擋的，努力描述台灣自身的歷史和傷痛的女作家。從文化產業的立場上看，此舉在短期利益上或許不如製造出「張愛玲」這一超級文化符號，但是從長遠來看，她樂觀地認為，此舉最終能夠開發出多樣而豐富的商品，最終能夠刺激消費。

當然，邱貴芬主張的所謂「告別張愛玲」不是完全無視或清算張愛玲傳統。她的主張的核心內容是，雖然無法忽略張愛玲的影響力，但是如果過於自然地將她納入到台灣文學譜系之中，會不斷地啓動「中國想像」，因而有必要對此提高警惕。為解決兩者之間的矛盾，邱貴芬提出，有必要將文學史視為「非連續性」的存在。也就是說，傳統的文學史論一直以「傳承」、「連續性」的概念為中心，歷史性地建構作家們的創作活動。台灣女性文學史則有必要採取強調台灣不同時代女作家之間的非連續性的策略。因為從中可以探明，台灣的政權交替帶給女性文學活動以怎樣的影響；相互競爭的多種文學傳統通過何種途徑如何介入擁有多種背景的女作家們的創作；多種文學傳統與作家的關係是否與她的種族、地理背景有關等問題。³²

邱貴芬的上述主張對於台灣女性文學傳統的研究來講，都是絕對有必要傾聽的。但是她所主張的「告別張愛玲」中所包含的意義依然顯得模糊。她所追求的台灣女性文學傳統的確立難道必須就以「告別張愛玲」為前提不成？其實，對於豐富台灣「女性」文學及其研究，「告別張愛玲」也許不是必要條件。但是，講述「台灣」的女性文學，「告別張愛玲」就能成為重要條件。邱貴芬的主張之所以顯得模糊，是因為她模糊地處理了此兩者之間的矛盾。

簡言之，邱貴芬主張「告別張愛玲」的最重要的理由是，在台灣「張愛玲」一直成為「中國想像」的重要機制。而「中國想像」之所以必定成為她所關注的問題，是因為它是文化殖民主義的延續，成

32 邱貴芬，同上書，448頁。

為構築台灣獨立的國族共同體的絆腳石。但是從女性文學傳統的側面上看，張愛玲不就已經深深地植根於台灣女性文學傳統之中，而且是具有豐富的可持續研究價值的作家嗎？因此，對於女性文學傳統的樹立，或許繼續研究張愛玲傳統而專有它，比「告別張愛玲」更具有必要性。

也許，邱貴芬也不否認這一點。但是她依然主張「告別張愛玲」，是因為她更加注重自己作為台灣獨立派的自我身分認同，而不是女權主義者的身分。她雖然從「張愛玲」現象的深層犀利地察覺到「中國想像」這一國族主義意圖，但是將其掩蓋在自己排斥中華國族主義，鼓吹台灣國族主義的目標之下。因此，邱貴芬沒有注意張愛玲對作為男性中心支配意識形態的國族話語做出的批判。與陳芳明相同，邱貴芬也忽略了張愛玲的文本成為中華國族主義和台灣國族主義這一宏大敘事的對抗性文本的可能性。

如果作為女性主義者邱貴芬對此要進行更深層的思考，就不應該急於提出「告別張愛玲」的主張，而是需要思考如下一些問題：在張愛玲「現象」和「中國想像」之間，各種國族主義話語怎樣消費或專有作為女性文本的張愛玲？譬如，當陳芳明般的論者為了提倡台灣的後殖民而專有張愛玲這女性文本的時候，是否會使得文本裡的女性現實和作家所採取的女性主義戰略被遮蔽而看不見？如果台灣的後殖民確實要賦予其間一直被壓抑的台灣歷史和主體以她們自己的聲音，那麼，為使它不要再被吸收到另外一個國族主義，而創造出能發出女性們多樣聲音的空間，女性主義學者應該採取什麼樣的戰略？即，不管是「中華國族主義」還是「台灣國族主義」，女性主義為了干預那些男性中心權力話語的國族主義，需要採取什麼樣的戰略？如果，像邱貴芬主張的那樣，為建構台灣女性文學傳統而需要「非連續性」敘事戰略的話，那麼，首先要更關注的問題是否不是急於提出「告別張愛玲」，而是將她的文學世界確立在那樣的「非連續性」傳統裡面？

四、界限的不穩定

很少有什麼可以像文學行為那樣深入到政治社會性的近代國族宣言之中。通過文學制度的多樣性——包括文本、報紙、雜誌、批評、文學史的編撰、文學獎的制定、出版、文學教育等——形成的多種國族敘事是同時呈現國族界限的外延和內部非延續性的遂行過程。在這些互相競爭的敘事中，國族的界限依然以模糊的狀態反覆地形成著。和建立台灣文學史同時，在世界華裔社會範圍中，也正在進行著編撰中華文學史的試圖，這也能顯現文學制度是如何介入到生產那麼模糊的國族界限之中的。³³

在文學制度方面國族界限的新造型，首先體現在文學史著述中試圖將包括台灣、香港在內的大陸以外地區的文學劃歸到「中國文學」範圍之內的努力之中。最近出版的幾部《華文文學史》、《中華文學史》等甚至顯露出，試圖將「中國文學」的界限擴大到文化的範圍，而不僅限在領土範圍。1999年香港的《亞洲週刊》舉辦的「二十世紀中文小說一百強」選拔，也從一個側面表現出文化國族主義的意圖。³⁴

33 中華文學史編撰與二十世紀80年代以後在大陸急速興起的「中華國族主義」有關。「中華國族主義」明顯地代替政治性冷戰意識形態的空白，發揮著合法化話語的功能。它吻合於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高速地全球化的同時，全世界範圍內興起國族主義這一後冷戰時代的顯著特徵。近代以後散佈在廣闊地域的「中華國族」隨著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退卻和資本全球化的趨勢中，迅速尋找到重新結合的機會。再加上，1997年和1999年，原來的殖民地香港和澳門接連回歸大陸，成為大步促進「中華國族」經濟、政治大團結的一種標誌。同時，中國大陸能夠在全球範圍內的經濟蕭條中依然維持7-8%的高經濟增長率，很大程度上借助於全世界華僑資本的集中投資。這從一個側面體現出「中華國族」大團結的經濟現實。

34 二十一世紀即將到來之際，《亞洲週刊》以「不僅是現代中國文學史的一部分，將範圍擴大，包攬全世界華人的寫作和讀書經驗」為目的，委託大陸5人（余秋雨、王蒙、王曉明、劉再複、謝冕）、台灣2人（王杏慶即南方朔、施淑）、香港3人（劉以鬯、黃繼持、黃子平）、馬來西

「二十世紀中文小說一百強」的選拔過程和選拔內容，本身能夠成爲非常有趣的研究物件。如，它所採用的辭彙是「中文」這一更爲文化的和廣泛的辭彙，而不是政治性象徵意味更強的「中國」。因爲「中文」比「中國」更容易讓人想起更加本質的和古代的國族淵源。正如在日韓人學者李燕淑的研究表明，近代國語是能夠將國族國家想像成帶有某種永恆的起源的歷史共同體，而不是近代文化組成物的核心機制。在此，「中文」這一文化概念避開了中國大陸、台灣、香港及眾多少數民族之間尖銳的政治矛盾，讓人們超越其所有界限，在深層的起源中想像聯爲一體的巨大國族共同體。

它連接在以泛華人社會爲基礎的「中華國族」這一巨大的「中文文化圈」的想像。而且，正如「英美文學不僅是指英國或美國的文學」，中文小說也不僅是指中國的小說。「二十世紀中文小說一百強」的這一企劃意圖並不隱藏其試圖將中文文化圈壯大爲能夠對抗以美國爲中心的英美文化圈的對抗性文化勢力的霸權欲望。它與華僑資本的流向也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但是與此同時，新興的泛華人世界的文化國族主義，可以看成是對隨著帝國主義的侵略而多樣化的，近代離散、東／西問題、人種等具有差別性的身分界限的一種對抗方式，同時也是宏觀治癒的一環。

能夠使人想像到作爲國族共同體的巨大「中華國族」的多種敘事，與爲期待和鼓吹台灣獨立而進行的台灣文學史敘事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因爲所謂的中華文學史嚮往統合，台灣文學史則嚮往分離。但兩者只是一個硬幣的兩面而已，即，是在政治上追求獨立而在文化上則要和大中華文明認同，這一矛盾的身分認同欲求的兩個表現。例

亞1人（潘雨同）、新加坡1人（黃孟文）等，共14位評委，選拔出代表二十世紀的一百部作品。據說，代表各地的評委們各自從雜誌社提供的五百部作品目錄中第一次選擇一百部，再以此爲基礎，經過半年多的激烈爭論，才最終完成從第一到一百的目錄。詳細內容請參照〈百年的〈吶喊〉、〈傳奇〉的世紀〉（《亞洲週刊》1999年6月14日~6月20日）。

如，台灣國族主義不太願意將張愛玲納入到台灣新文學史，但是他們也不太願意拋棄張愛玲代表的中華文明認同。總之，中華文學史和台灣文學史的編撰雖然是相反的方式，但是兩者都有著重新劃定國族界限的意圖，兩者同樣從反面證明，國族界限的不穩定和過程性。

總而言之，本文要通過對張愛玲這樣的女作家文本在東亞的後殖民和冷戰秩序構築當中被台灣接受的一些脈絡，以及在台灣國族主義高揚的背景下台灣新文學史要怎樣處理張愛玲的考察，闡述文學制度介入到國族想像的一種方式。而且，也要闡釋台灣獨立派人士們要怎樣處理好文化上的身分認同物件和政治上的身分認同物件之間的不一致，及其不可避免的理論上的困境。

從上述的分析來看，陳芳明和邱貴芬之間是矛盾的互補關係。陳芳明方面，爲了在中華國族主義之中主張後殖民，將張愛玲的文本解釋爲「後殖民呈現」，並積極予以接受，卻陷入一種矛盾狀態，即，對張愛玲的專有本身就是自己所要擺脫的文化殖民主義——「中國想像」的一環。相反，邱貴芬方面，爲擺脫「中國想像」這一文化殖民主義和樹立台灣女性文學傳統，主張「告別張愛玲」，但是，她對建構台灣女性文學傳統的計畫卻沒能容納張愛玲這位對台灣女性文學影響那麼大的優秀女作家。但是陳芳明和邱貴芬有著某些共同點。在相互較量的兩種國族主義之間，他們都傾向於台灣國族主義——新國族創造的夢、想像和意志，他們與對作爲宏大敘事的國族主義表現出反感的張愛玲之間終究會形成緊張關係。

如果，陳芳明和邱貴芬的終極關懷是包括女性在內的少數群體身分認同的去邊緣化，那麼它與他們爲建設又一國族共同體而做出的批判性努力，能夠產生怎樣的和解，對此尚有待觀察。當初，台灣本土意識也是一種對少數群體的關懷。但是，萬一那些關懷被吸收到國族主義這嚮往同質化的宏大敘事之中，其原來所具有的抵抗性本身很可能會消失。文化上的身分認同和政治上的身分認同之間、國族國家身分認同和少數群體身分認同之間的矛盾，她們對此的省察，能否與

國族國家界限本身的同質化欲望保持距離？她們對台灣被壓抑的記憶和差異的歷史的復原試圖，爲了不被吸收到台灣國族主義這宏大敘事中，陳芳明的「編撰台灣新文學史」和邱貴芬的「建構台灣女性文學傳統」需要採取怎樣的敘事戰略？或許，「編撰文學史」、「建構傳統」計畫本身就無法擺脫那樣的危險？還有，同樣面臨著分裂狀態的南北朝鮮半島文學史家們又怎麼能將建構台灣新文學史過程當中的困境作爲借鑒呢？